



北齐墓葬文化格局论*

倪润安

内容提要 随着北魏的分裂，北朝墓葬文化格局再次发生变化，奠定了此后隋唐文化的发展趋势，其中东魏—北齐所起的作用更显重要。东魏都城邺城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种类与组合延续着北魏末期洛阳地区的基本特征，墓葬壁画则突破北魏中、晚期墓葬所遵循的“晋制”的束缚，开创了新的范式。不过，都城地区的文化辐射强度偏弱。至北齐时期，新的墓葬文化格局趋于定型。北齐霸府晋阳与都城邺城形成“双核”体制，呈现出一体两面、文武兼备的互动关系，都城地区墓葬文化的影响力明显增强。但是，北齐东方地区的汉人士族墓葬在文化上存在着较多与邺城、晋阳不一致的异动，尤以青齐地区最突出。北齐灭亡后，其文化残局从正、负两个方面深刻影响了隋唐社会制度与历史走向。

关键词 北齐 墓葬文化格局 双核体制 东方异动 正负影响

随着北魏的分裂，北朝墓葬文化格局再次发生变化，成为此后隋唐文化的直接来源。其中东魏-北齐墓葬文化相较于西魏-北周所起的作用更显突出，历来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已从分区、分期、等级、文化构成与演变等方面对其特征做了系统分析^{〔1〕}。东魏—北齐墓葬文化中，东魏是铺垫期，北齐是成熟期，东魏是北齐的基础，北齐集大成而凝为定型模式。以北齐墓葬文化为中心，进一步深层揭示其形成机制、内部结构及相互作用等问题仍有较大的探讨空间：北齐墓葬文化经由东魏继承北魏，最终突破了北魏墓葬文化的既有框架，其关键变化是什么？为吸取北魏晚期洛阳文化发展的教训，北齐墓葬文化建构了新的格局。这一格局以怎样的形式发挥作用，同时存在怎样的问题？北周灭亡北齐后，北齐墓葬文化格局的遗产又如何对随后统一的隋唐帝国的兴衰起伏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将从这些方面整体性地总结和思考北齐墓葬文化的格局演变。

* 本文为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古时期丧葬的观念风俗与礼仪制度》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3JJD780001。

〔1〕 苏哲：《东魏北齐壁画墓の等级差别と地域性》，《博古研究》第4号，[日]博古研究会，1992年；杨效俊：《东魏、北齐墓葬的考古学研究》，《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5期；李梅田：《北齐墓葬文化因素分析——以邺城、晋阳为中心》，《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李梅田：《北齐墓葬文化论析》，《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6期。





一 北齐的基础：东魏墓葬的文化特征

北齐墓葬文化的格局脱离不了东魏奠定的框架和基础。东魏存续16年，是北魏向北齐过渡的重要时期，既体现了文化的连续性，又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新特征。从已公布考古资料的情况看，东魏墓葬可分为邺城、青齐、冀定三个文化区。邺城地区有天平四年(537)安阳县赵明度墓¹¹、天平四年(537)磁县元祐墓¹²、武定五年(547)磁县尧赵氏墓¹³、武定八年(550)磁县茹茹公主墓¹⁴、安阳市固岸墓地II区M51¹⁵等；青齐地区有天平四年(537)临淄崔氏墓地M14崔鹞墓¹⁶、天平五年(538)济南市崔令姿墓¹⁷、元象元年(538)临淄崔氏墓地M3崔混墓¹⁸、兴和三年(541)高唐县房悦墓¹⁹、临淄崔氏墓地M7¹¹⁰等；冀定地区有天平四年(537)景县高雅夫妇及子女合葬墓¹¹¹、兴和三年(541)景县封延之墓¹¹²、武定二年(544)赞皇¹¹³李希宗夫妇墓¹¹⁴、武定四年(546)吴桥封柔夫妇合葬墓¹¹⁵、武定五年(547)景县长命墓¹¹⁶、吴桥北朝墓葬M2¹¹⁷等。

邺城是东魏的都城，是毫无疑问的文化中心区域，也是分析东魏墓葬文化演变的首选之地。

11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阳县东魏赵明度墓》，《考古》2010年第10期。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工作队：《河北磁县北朝墓群发现东魏皇族元祐墓》，《考古》2007年第11期。

13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墓》，《考古》1977年第6期。

14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汤池：《东魏茹茹公主墓壁画试探》，《文物》1984年第4期。

15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阳市固岸墓地II区51号东魏墓》，《考古》2008年第5期。

16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17 济南市博物馆，王建浩、蒋宝庚：《济南市东郊发现东魏墓》，《文物》1966年第4期。

18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19 山东省博物馆文物组：《山东高唐东魏房悦墓清理纪要》，《文物资料丛刊》2，文物出版社，1978年。

110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111 河北省文管处：《河北景县北魏高氏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3期。

112 张季：《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考古通讯》1957年第3期。

113 东魏时，赞皇属于殷州。《魏书》卷一六上《地形志上》记载：“殷州，孝昌二年(526年)分定、相二州置。”(页2470，中华书局，1974年)赞皇处于殷州北部，原属北魏定州。本文为避免名称冗长，所指冀、定地区包括殷州北部的赞皇等地。

114 石家庄地区革委会文化局文物发掘组：《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第6期。

115 张平一：《河北吴桥县发现东魏墓》，《考古通讯》1956年第6期。

116 河北省文管处：《河北景县北魏高氏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3期。

117 河北省沧州地区文化馆：《河北省吴桥四座北朝墓葬》，《文物》1984年第9期。





邺城建都所依靠的人力、物力资源主要来自北魏都城洛阳。天平元年(534)，“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陕，洛阳复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晋阳，形势不能相接，乃议迁邺，护军祖莹赞焉。诏下三日，车驾便发，户四十万狼狽就道”¹。迁邺将洛阳人口大量迁走，其中也包括各类工匠。此外，洛阳的宫殿全部被拆除，材料运到邺城去修新殿、建新城。“以十万夫撤洛阳宫殿，运于邺，构营之制，皆委隆之。增筑南城，周二十五里”²。这些拆旧建新工程所用的人力达到“十万夫”，主体必然是洛阳原有的工匠和居民。由于这些人的大批迁入，邺城墓葬文化很难避免对洛阳的复制。

墓葬形制方面，邺城墓葬都是长斜坡墓道单室墓，坐北朝南，墓室平面呈弧方形或近方形，分为砖室墓和土洞墓，继承了洛阳地区北魏晚期墓葬的特征。在尺寸上有等级差别，但在材质上，砖室墓和土洞墓之间没有等级区分。如徐州刺史元祐墓墓室长4.5-4.7、宽4.3-5米，南阳郡君尧赵氏墓墓室长4.8、宽4.26米，二者尺寸接近，地位相当，前者为土洞墓，后者则为砖室墓。而博陵太守赵明度级别比元祐低，墓室长2.72、宽2.9米，也比元祐墓尺寸小，但使用的是砖室墓。洛阳地区土洞墓和砖室墓在北魏宣武帝时期形成了一定的等级差别，土洞墓适用于中下级官吏，砖室墓适用于皇室、王族和特定的高级贵族；但武泰元年(528)“河阴之变”后，这种等级差别遭到摧毁³。邺城东魏墓葬延续了洛阳北魏末期的特征，不以建筑质地区分等级。

随葬品方面，邺城墓葬中具有普遍性的是陶、瓷器，陶俑、陶禽畜和模型明器。这些器物的种类和组合承续了北魏晚期墓葬的衣钵，呈现出逐渐恢复的过程，到武定年间，北魏晚期出现过的种类绝大多数都恢复了，仅在个别种类上有所增损。陶器中，陶盘消失，新增陶勺；瓷器中，碗、钵、杯、碟组合消失，瓷灯消失，新增瓷瓶；陶俑中，新增负鞭俑、巫师俑；陶模型明器中，新增编钟、编磬。新增器物很不流行，并不影响北魏晚期以来的发展轨迹[表一]。

墓葬壁画方面，邺城墓葬突破北魏中、晚期墓葬所遵循的“晋制”的束缚，开创了墓葬壁画新范式。天平四年(537)元祐墓、武定八年(550)茹茹公主墓正好反映了东魏初、末期之间墓葬壁画构图的发展演变。元祐墓墓道两壁无壁画；墓室顶部壁画不详，北壁绘墓主人正坐于榻上，身后有7扇屏风，东、西壁各绘青龙、白虎，其后各有一侍吏，南壁在墓室入口两侧各绘一人物(应是门吏)。到茹茹公主墓时，墓室东、西壁的青龙、白虎前移到墓道东、西壁，与之相配的侍吏发展成14人的仪仗队伍，还新增了飞翔于队列之上的神兽、羽人、神禽等；墓道地面绘连续花草纹图案，如地毯；甬道入口上方绘朱雀；甬道两壁各有四位侍从，东壁尚存三人，东壁中一人双手执鞭，似喻示鞍马或牛车的隐性存在；墓室顶部塌毁，四壁上沿分别绘四神及山林，北壁仍是墓主人形象所在，绘女墓主人和两侧的侍女，出现在西壁的新题材是侍女10人，东壁是尚存7位的男子侍吏，南壁皆剥落。这

¹ 《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页18，中华书局，197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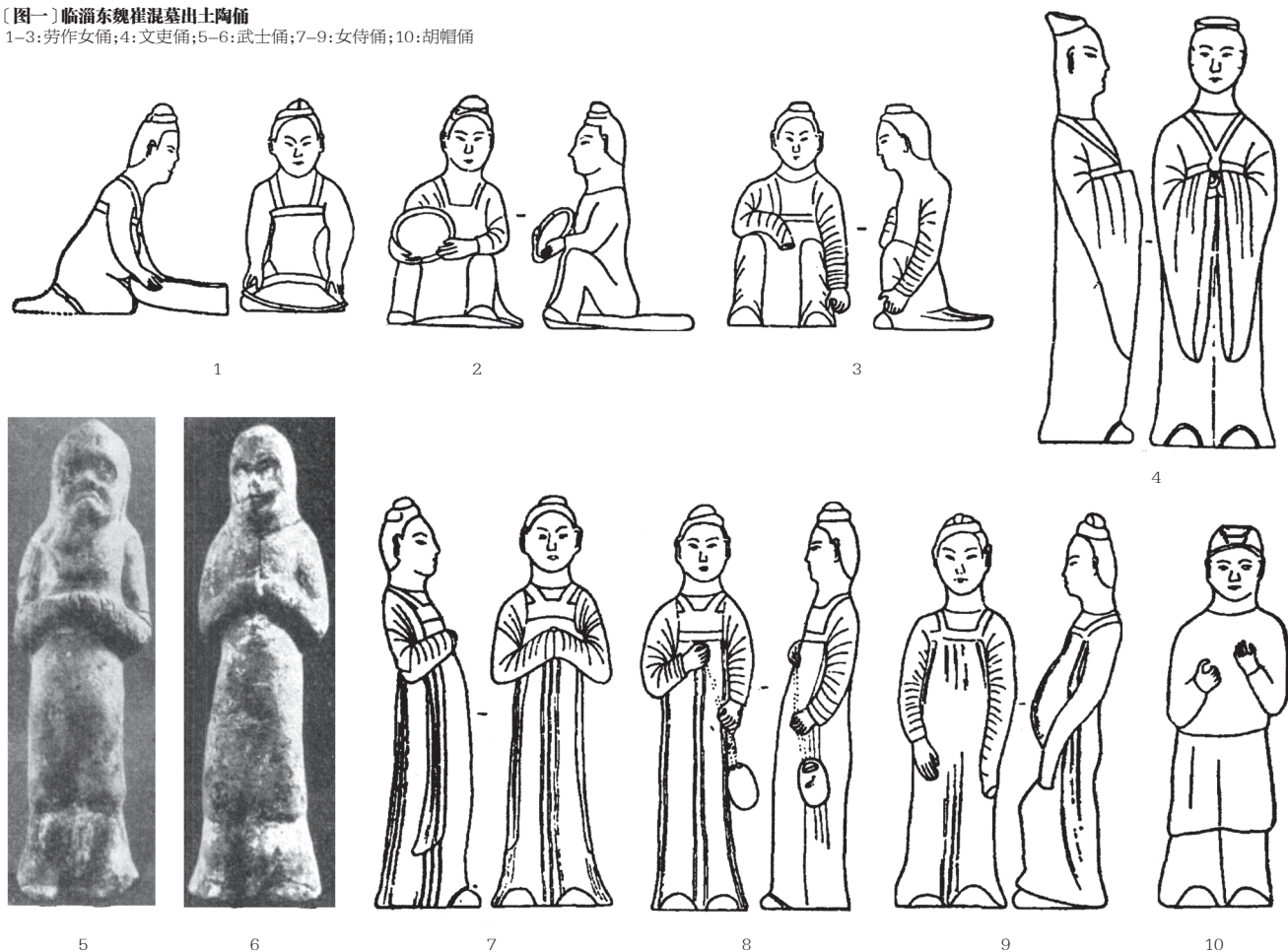
² 《北史》卷五四《高隆之传》，页1945，中华书局，1974年。

³ 倪润安：《北魏洛阳时代墓葬文化分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4期。



〔图一〕临淄东魏崔混墓出土陶俑

1-3:劳作女俑;4:文吏俑;5-6:武士俑;7-9:女侍俑;10:胡帽俑



种变化的迅速实现得益于北魏晚期石葬具画像题材的积累。北魏晚期，墓室壁画受到限制，石葬具则因为不在“晋制”传统因素之列，而得以独立发展画面。到东魏时期，墓室壁画解禁，石葬具画像题材被广泛借鉴，并适应墓葬由墓道、甬道至墓室的建筑结构而形成新的布局。

可见，邺城地区东魏墓葬的形制、随葬品都延续着北魏末期洛阳地区的基本特征，墓葬壁画则吸收北魏晚期石葬具的文化因素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青齐地区东魏墓则保持着北魏晚期以来形成的地方特征，以石室、圆形、单室墓为主流，皆无壁画；新现象是临淄崔鹗的圆形石室墓采用了单主室带一耳室的形制，济南崔令姿的圆形石室墓采用了前、后双室的结构，皆为北魏晚期墓葬所不用；陶俑方面，北魏晚期常见的半模、实身、平背俑以及独有的十二生肖俑消失，现有俑群呈现出两种发展趋势：一是造型与邺城地区基本相同，种类比邺城少一些，如高唐房悦墓；崔令姿墓的俑造型接近邺城，但为石质。二是发展新面貌的俑类，人物的服饰特征与邺城明显不同，如临淄崔混墓〔图一〕；该墓陶劳作女俑的捧物、提物形象虽然与邺城尧氏墓类似，但发式、服装迥异，前者为螺髻、身穿背带式齐胸长裙〔图一：1-3，7-9〕，后者为扇面髻或双髻、内着裙外穿交领衫〔图二〕。冀定地区的东魏墓兴起单主室带二耳室墓，如高雅夫妇





及子女合葬墓，和前、后双室墓，如李希宗夫妇墓、高长命墓等，均为砖室；较多墓葬平面呈近圆形或椭圆形、但为砖室，如高雅夫妇及子女合葬墓、封柔夫妇墓、高长命墓、吴桥北朝墓葬M2；部分墓葬有壁画残迹，如封柔夫妇墓、高长命墓，内容简略，尚体现着北魏晚期壁画不发达的风格；陶俑方面，已发现墓葬的陶俑造型和种类都与邺城地区差不多。相比之下，青齐、冀定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密切些，青齐地区流行的圆形墓葬形制传到冀定地区，表现为近圆形或椭圆形；从出现时间的先后看，冀定地区双室墓和单主室带耳室的形制大概也是受青齐地区的影响而出现，并且较青齐地区多见。而这两个地区在墓葬形制、壁画方面与邺城墓葬差别都较大，尤其是不受该区新兴壁画的影响；与邺城地区的交流主要体现在陶俑方面，冀定地区受邺城的影响又比青齐地区大。总的来说，邺城作为都城，其文化辐射强度不够，显示出王朝文化控制力偏弱，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对北魏晚期洛阳墓葬文化相同状况的延续。

〔图二〕磁县东魏尧赵氏墓出土陶劳作女俑



〔表一〕邺城东魏墓葬部分随葬品与北魏洛阳墓葬的比较

器物名称	北魏洛阳墓	赵明度墓	元祐墓	固岸墓地II区M51	尧赵氏墓	茹茹公主墓
陶器	矮领罐	✓			✓	
	高领罐	✓				
	盘口罐	✓				
	盘口壶	✓	✓		✓	
	壶	✓				✓
	瓶	✓				✓
	灯	✓		有，资料未全公布，种类不详		✓
	碗	✓			✓	✓
	钵	✓				✓
	杯	✓				✓
	盒	✓				✓
	盘	✓				
	盆	✓				✓
勺					✓	

[续表一]

器物名称		北魏洛阳墓	赵明度墓	元祜墓	固岸墓地II区M51	尧赵氏墓	茹茹公主墓	
瓷器	碗	√	√	有, 资料未全公布, 种类不详				
	钵	√						
	杯	√						
	碟	√						
	罐	√无耳	√无耳、四系				√四系	√六系
	壶	√鸡首、四系					√无耳	
	瓶						√无耳、双耳	
	灯	√						
陶俑	镇墓兽	√		√	√	√	√	
	镇墓武士	√				√	√	
	执盾步兵俑	√		√	√	√	√	
	文吏俑	√			√	√	√	
	武吏俑	√		√	√	√	√	
	男侍俑	√			√	√	√	
	女侍俑	√				√	√	
	笼冠俑	√				√	√	
	风帽俑	√		√		√	√	
	步行鼓吹俑	√				√	√	
	骑马鼓吹俑	√					√	
	甲骑具装俑	√		√		√	√	
	骑马侍从俑	√		√		√	√	
	奏乐俑	√					√(失乐器)	
	劳作俑	√		√	√	√	√	
	负箭囊俑	√		√	√	√	√	
负鞭俑						√		
胡俑	√				√	√		
巫师俑						√		
陶禽畜	牛车	√		有, 资料未全公布, 种类不详	√	√	√	
	鞍马	√				√	√	
	驼	√					√	
	驴	√					√	
	猪	√				√	√	√
	狗	√				√	√	√
	羊	√				√	√	√
	鸡	√				√	√	√

[续表一]

器物名称		北魏洛阳墓	赵明度墓	元祐墓	固岸墓地II区M51	尧赵氏墓	茹茹公主墓
陶 模 型 明 器	灶	√		有，资料未全公布， 种类不详	√	√	√
	井	√			√	√	√
	磨	√			√	√	√
	仓	√			√	√	√
	碓	√			√	√	√
	厕	√			√		√
	编钟、编磬						

二 文武之道：邺城与晋阳的北齐墓葬

随着北齐的建立、王权的重振，东魏墓葬文化格局得到强有力的改造。邺城之外，晋阳崛起为新的文化中心，前者文质彬彬，后者武风起，文武之道，并行发展，构建起北齐墓葬文化的“双核”体制。

墓葬形制方面，砖室墓与土洞墓之间的等级关系重新得到建立。邺城、晋阳及其附近地区的北齐墓葬类型单一，只有单室砖墓和单室土洞墓两类，墓室平面呈近方形或长方形。有学者将砖室墓划分为三个等级，指出土洞墓的墓主身份多属中低级官吏，与砖室墓第三等级墓主相当，但墓葬规格明显较低^①。循此思路，我们对比一下邺城和晋阳地区北齐墓葬的等级序列。第一等级属于帝王，只有近方形砖室墓，仅出现在北齐都城邺城附近，如可能属于文宣帝高洋的湾漳大墓^②，墓室尺寸约7.5米见方[表二]。第二等级属于封王爵的高级官吏，也只见近方形砖室墓，如邺城地区的冯翊王高润墓^③、修城王高孝绪墓^④，晋阳地区的顺阳王库狄迴洛墓^⑤、东安王娄睿墓^⑥、武安王徐显秀墓^⑦等，墓室尺寸均在5.5-6.5米见方左右；另外，太姬崔幼妃子嗣与北齐六位皇帝中的三位联姻，有一女儿为皇后、一孙女为废后、一孙女为皇妃，两个儿子得以封王，堪称外戚世家，故其父北魏

① 李梅田：《北齐墓葬文化论析》，《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6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③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考古》1979年第3期。

④ 张晓峥：《河北磁县北齐高孝绪墓》，《200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页100—105，文物出版社，2010年。

⑤ 王克林：《北齐库狄迴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⑥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齐东安王娄睿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

⑦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0期。



仪同三司崔楷北齐改葬时，依王爵待遇安葬，墓室尺寸约6米见方¹¹[表二]。第三等级多为中、低级官吏，包括砖室墓、土洞墓，既有近方形，也有长方形的。近方形墓葬中，砖室墓如邺城地区的刘通墓¹²、尧峻墓¹³、贾宝墓¹⁴、和绍隆墓¹⁵、叔孙多奴墓¹⁶，晋阳地区的贺拔昌墓¹⁷、朔州水泉梁北齐墓¹⁸、太原热电厂北齐壁画墓¹⁹等，土洞墓如邺城地区的李华墓²⁰、贾进墓²¹、范粹墓²²、颜玉光墓²³，晋阳地区的夏侯念墓²⁴、窦兴洛墓²⁵、张肃俗墓²⁶、侯莫陈阿伏仁墓²⁷等；墓室尺寸在2.5-5米见方左右，大致可以3.5米见方为界，将方形砖室墓与土洞墓分成两个规格[表二]。长方形墓葬中，基本都是土洞墓，个别为砖室墓，如邺城地区的元良墓²⁸，晋阳地区的库狄业墓²⁹、狄湛墓³⁰、柳子辉墓³¹、张海翼墓³²等，墓

11 田韶品：《曲阳北魏崔楷墓》，《文物春秋》2009年第6期；倪润安：《河北曲阳北魏崔楷墓的年代及相关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2期。

12 河南省文物局：《安阳北朝墓葬》页14—23，科学出版社，2013年。

13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北齐尧峻墓》，《文物》1984年第4期。

14 河南省文物局：《安阳北朝墓葬》页80—97，科学出版社，2013年。

1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安阳县文管会：《安阳北齐和绍隆夫妇合葬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7年第1期。

16 河南省文物局：《安阳北朝墓葬》页23—34，科学出版社，2013年。

17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贺拔昌墓》，《文物》2003年第3期。

1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12期。

1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北齐壁画墓》，《文物》1990年第12期。

20 河南省文物局：《安阳北朝墓葬》页65—70，科学出版社，2013年。

21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管理办公室、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阳县北齐贾进墓》，《考古》2011年第4期。

22 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

23 安阳县文教局：《河南安阳县清理一座北齐墓》，《考古》1973年第2期。颜玉光的墓葬规格与其身份不符，有研究者认为这与北齐宫闱之丑有关，其墓室也非官方修建（见刘伟航、刘玉山：《〈颜玉光墓志〉探微》，《许昌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2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太原西北环高速公路建设墓葬发掘简报》，《三晋考古》第三辑，页328—335，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2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开化村北齐洞室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2期。

26 山西省博物馆：《太原扩坡北齐张肃墓文物图录》，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

2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西南郊北齐洞室墓》，《文物》2004年第6期。

28 磁县文物保管所：《河北磁县北齐元良墓》，《考古》1997年第3期。

29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库狄业墓》，《文物》2003年第3期。

30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狄湛墓》，《文物》2003年第3期。

31 王玉山：《太原市南郊清理北齐墓葬一座》，《文物》1963年第6期。

32 李爱国：《太原北齐张海翼墓》，《文物》2003年第10期。



室尺寸皆在长2-4.5、宽1.5-3米左右[表三]。从墓葬材质看，砖室墓的等级明显高于洞室墓，是高等级墓葬的一致选择。从墓葬各等级的对应关系看，晋阳地区与邺城地区之间形成了同步发展的机制。

[表二] 北齐邺城与晋阳地区近方形墓葬的等级比较

等级	邺城地区				晋阳地区			
	墓葬名称	材质与尺寸	墓葬年代	墓主身份	墓葬名称	材质与尺寸	墓葬年代	墓主身份
第一等级	湾漳大墓	砖室 7.56×7.4	乾明元年 (560)?	文宣帝高洋?				
第二等级	高润墓	砖室 6.4×6.45	武平七年 (576)	侍中、假黄钺、 左丞相、冯翊王	库狄迴洛墓	砖室 5.44×5.42	河清元年 (562)	定州刺史、太尉 公、顺阳王
	高孝绪墓	砖室 5.2×5.6	不详	修城王	娄睿墓	砖室 5.65×5.7	武平元年 (570)	假黄钺、右丞 相、东安王
	崔楷墓	砖室 约6×6	不详	北魏仪同三司、 北齐外戚太姬 崔幼妃之父	徐显秀墓	砖室 6.65×6.3	武平二年 (571)	太尉公、太保、 尚书令、武安王
第三等级	刘通墓	砖室 4.86×4.64	武平三年 (572)	开府仪同三司、 瀛洲六州大都 督，赠赵州刺 史、中书监	贺拔昌墓	砖室 4.8×4.8	天保四年 (553)	右卫将军、开府 仪同三司
	尧峻墓	砖室 4.38×4.52	天统三年 (567)	开府仪同三司、 怀州刺史	朔州水泉梁北 齐墓	砖室 4.5×4.5	不详	不详
	贾宝墓	砖室 3.88×3.25	武平四年 (573)	车骑大将军、郑 州扶沟县令	夏侯念墓	土洞 3.6×3.4	天保三年 (552)	七帝寺优婆塞
	和绍隆墓	砖室 3.6×3.5	天统四年 (568)	赠东徐州刺史	窦兴洛墓	土洞 3.2×2.83	天保十年 (559)	直斋都督
	叔孙多奴墓	砖室 3.28×2.9	武平元年 (570)	翊军将军、豫州 别驾薛君夫人	张肃俗墓	土洞 2.9×2.9	天保十年 (559)	处士
	李华墓	土洞 (2.5-3.58)×3.2	武平七年 (576)	郑州刺史陆君 夫人	太原热电厂壁 画墓	砖室 2.68×2.68	不详	不详
	贾进墓	土洞 3×2.9	武平三年 (572)	郎中令、车骑大 将军	侯莫陈阿伏仁 墓	土洞 2.6×(1.9-2.7)	天保六年 (555)	直閣正都督
	范粹墓	土洞 2.88×2.7	武平六年 (575)	东雍州刺史、太 傅卿				
	颜玉光墓	土洞 2.4×2.36	武平七年 (576)	文宣帝弘德夫 人				



[表三] 北齐邺城与晋阳地区长方形墓葬的等级比较

等级	邺城地区				晋阳地区			
	墓葬名称	材质与尺寸	墓葬年代	墓主身份	墓葬名称	材质与尺寸	墓葬年代	墓主身份
第三等级	元良墓	土洞 4.4×3.1	天保四年 (553)	不详	库狄业墓	土洞 4.2×(2.1-2.6)	天统三年 (567)	仪同三司、北尉少卿
					狄湛墓	土洞 3.4×1.77	河清三年 (564)	车骑将军、涇州刺史
					柳子辉墓	砖室 3×1.54	天保七年 (556)	直口大都督
					张海翼墓	土洞 2.2×(1.23-1.83)	天统元年 (565)	徐州司马

墓葬壁画方面，邺城地区进一步完善茹茹公主墓壁画所确立的新思路。湾漳大墓从墓道到甬道的壁画内容基本清楚，墓室四壁模糊不清，结合高润墓室壁画的情况，可把邺城北齐墓的壁画构图方式归纳为：墓道至甬道的两壁绘步行仪仗出行图，最前列一般由青龙、白虎引导，后段仪仗的上方绘神兽、羽人、神禽等；墓室顶部为天象、四神、十二生肖、神兽异禽等，北壁为墓主人与两侧侍从，东壁为牛车出行图，西壁推测为鞍马出行图，南壁不详。这种图式在晋阳地区有更充分和清晰的展现。从娄睿墓、徐显秀墓、朔州水泉梁北齐墓的情况看[表四]，墓室四壁与顶部壁画的布局和内容与邺城地区基本相同，顶部绘天象、北壁绘墓主人、东、西壁分绘鞍马或牛车出行已形成定式，南壁壁画的内容会有较大变化，有时与墓道、甬道的壁画联系紧密，有时相对独立。晋阳地区墓葬壁画与邺城地区最大的差异出现在墓道(过洞、天井)，虽然均为仪仗出行图，但晋阳地区步骑混合，骑行人物突出，表现军乐鼓吹，以娄睿墓最具代表性[图三：2]；朔州水泉梁北齐墓的墓道虽无壁画，但相应的内容转移到甬道和墓室东、西壁，均绘出远景式的骑行马队。而邺城地区墓道的仪仗出行图全为步行人物，无驼、马，湾漳大墓仪仗图中戴笼冠和小冠的人物占大多数，后段廊庑下树立体现身份等级的槩髻[图三：1]。这两个地区墓道壁画细节的不同，恰恰可以反映出邺城地区标榜文治、晋阳地区崇尚武功的特点。新出忻州九原岗北齐壁画墓，以鞍马、侍从、武士表现出行的内容，全为步行人物，但较之更为突出的是山林狩猎图^①；这一题材是北魏早期壁画墓的主要内容之一^②，北魏中、晚期伴随壁画的衰落而消失，北齐重现这一题材的墓葬并不多见，反映出墓主人对武功的推崇更为备至，亦符合晋阳地区墓葬壁画的精神内涵。要言之，文武兼备、互为表里应是北齐皇帝处理都城与霸府关系的有意之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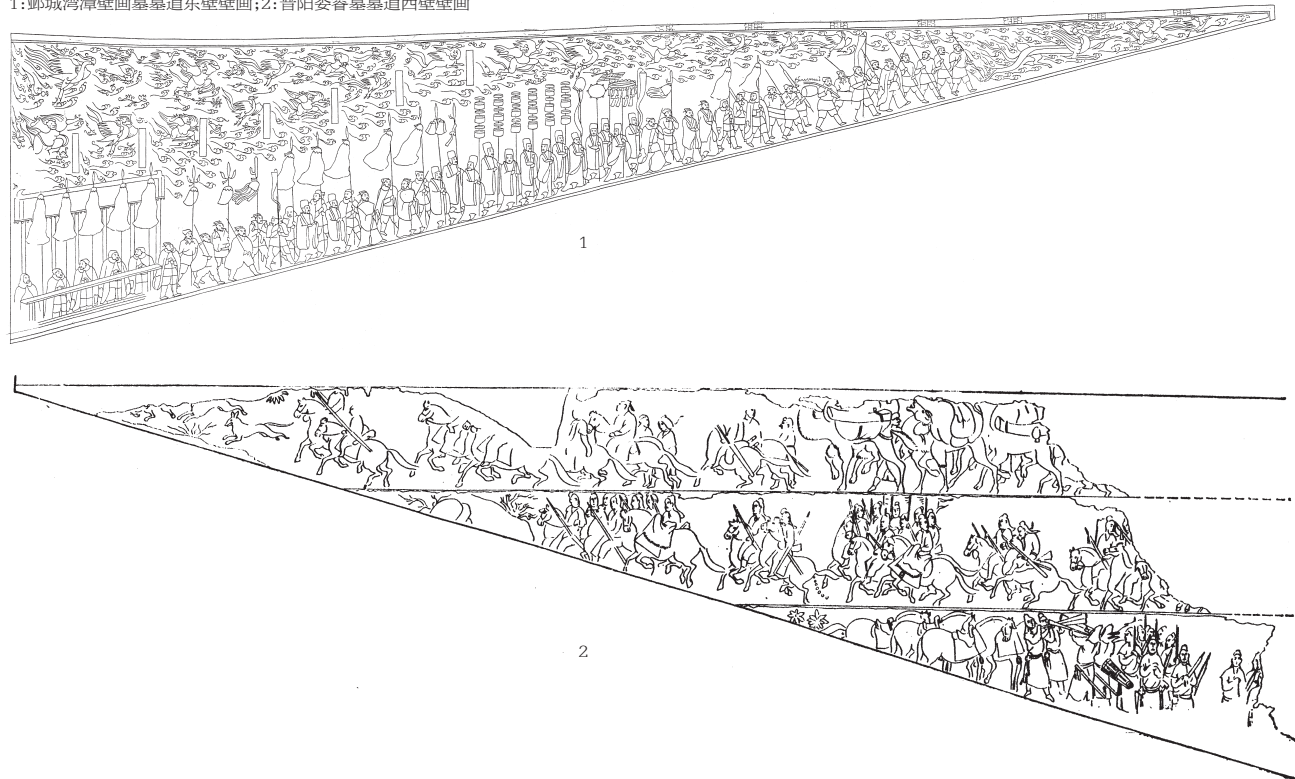
① 扬之水：《忻州北朝壁画墓观画散记》，《大众考古》2014年第3期。

② 倪润安：《北魏平城时代平城墓葬的文化转型》，《考古学报》2014年第1期。



〔图三〕邺城湾漳壁画墓墓道东壁壁画

1:邺城湾漳壁画墓墓道东壁壁画;2:晋阳娄睿墓墓道西壁壁画



〔表四〕晋阳地区北齐墓葬壁画举例

序号	墓葬名称	墓道(过洞、天井)	甬道	墓室四壁	墓室顶部
1	娄睿墓	墓道西壁绘仪仗出行图,东壁仪仗回归图,步骑混合,有骑队、驼队、无人骑鞍马、军乐鼓吹、拱手仪卫、仗剑仪卫等。后段仪仗的上方绘神兽、羽人、神禽。	仪卫	北壁绘墓主夫妇并坐宴乐,东壁绘鞍马出行图,西壁绘牛车出行图,南壁东侧绘两位树下武士、西侧壁画脱落。	天象,四神、十二生肖,仙人、雷公等。
2	徐显秀墓	墓道、过洞、天井两壁绘仪仗出行图,各有2个神兽作前导,步骑混合,有步行人物、无人骑鞍马、军乐鼓吹等。过洞入口上方绘门楼图。	仪卫	北壁绘墓主夫妇并坐宴乐、背设屏风,东壁绘牛车出行图,西壁绘鞍马出行图,南壁绘仪仗队伍。	天象,神兽等。
3	朔州水泉梁北齐墓	无	仪卫,并绘骑行马队为远景	北壁绘墓主夫妇并坐宴乐、背设屏风,东壁绘鞍马出行图,西壁绘牛车出行图,南壁绘鼓吹人物。东、西两壁南部均绘骑行马队为远景。	天象,四神、十二生肖。

俑群是北齐随葬品中引人注目的内容。从出土陶俑种类大多相同来看,邺城和晋阳遵循着共同的制度,但两地陶俑的造型特色又有着明显差异,有学者因此称它们为北齐陶俑的“两大样式”^{〔1〕}。大致说来,邺城地区的陶俑塑制精致,肥瘦适度,头与四肢、躯干的比例匀称;晋阳地区的陶俑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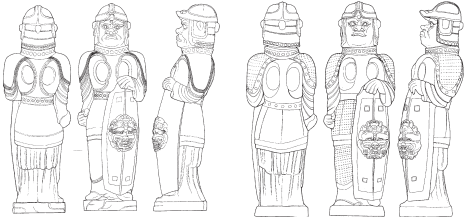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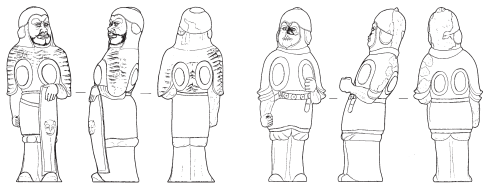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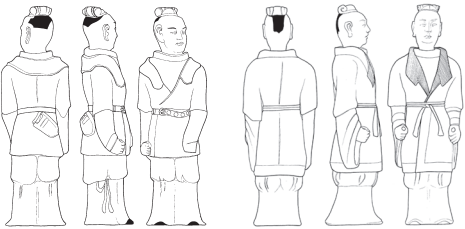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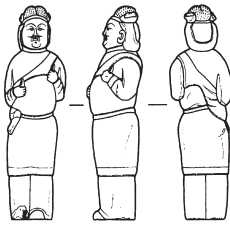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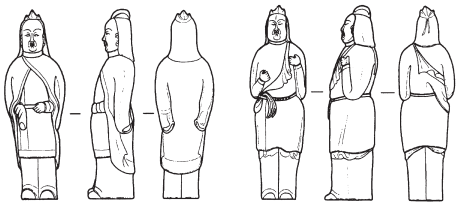
〔1〕 [日]小林仁(李娜译):《中国北齐随葬陶俑两大样式的形成及其意义》,《文物世界》2012年第1期。



相浑圆，下颐丰满，体型显得臃肿，腹胯圆鼓，下肢短而细，使全俑的轮廓近于梭形¹¹〔图四〕。究其背景，晋阳地区北齐墓的墓主人多为鲜卑等北方胡族，所出陶俑多身着胡服，强调浑圆、溜肩、腹部微腆的独特身姿，凸现了上身的魁梧，源于鲜卑视魁梧为“强悍”的审美观¹²。而邺城地区是汉人士族集中之地，虽然北齐恢复鲜卑服、鲜卑语，但在邺城汉人主导下的汉化进程仍然是时代的主流趋势¹³。所以，邺城的陶俑讲究匀称中庸，大多是文质彬彬的形象。晋阳与邺城陶俑种类近同、造型有异，实际上显示着北齐胡、汉分治的二元一体文化结构，同样也是文武之道的表现形式。

从墓葬文化各方面的特征看，北齐霸府晋阳与都城邺城形成了一体两面的互动关系，从而大为改变了东魏时期邺城在文化影响力上孤掌难鸣的被动局面。

〔图四〕邺城与晋阳地区北齐陶俑举例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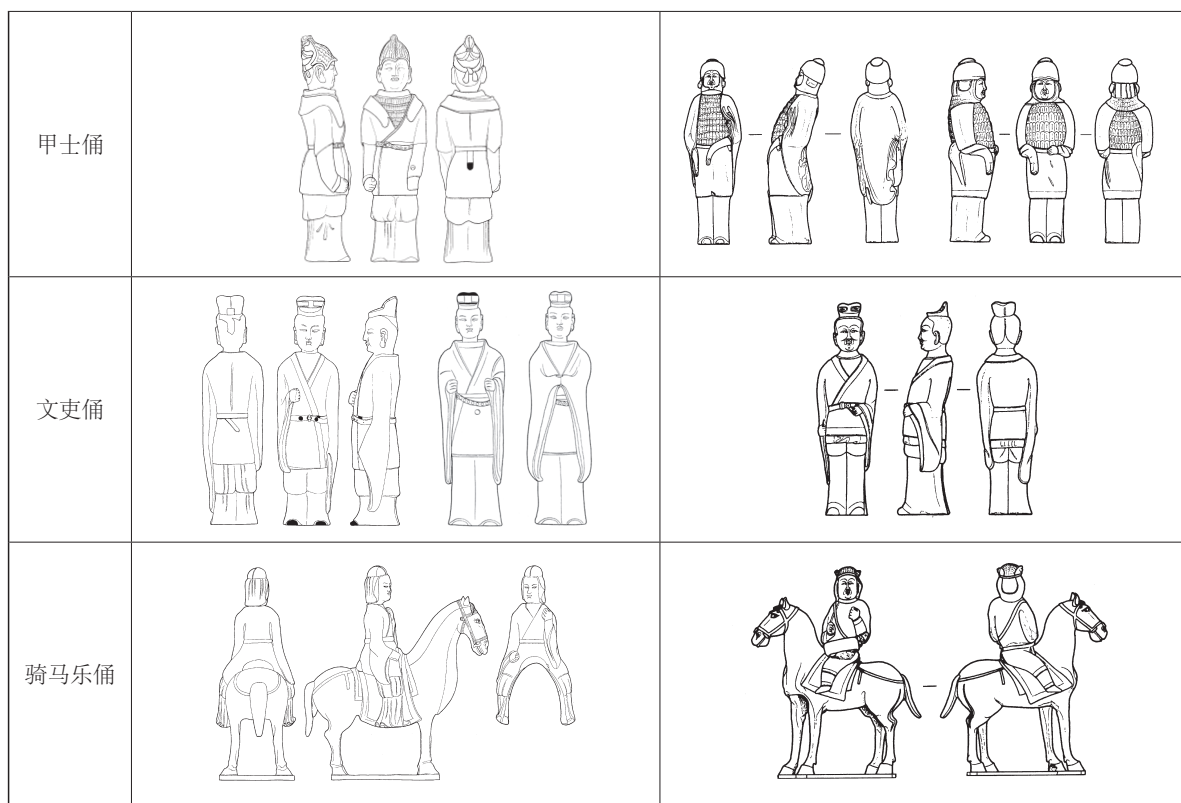
陶俑	邺城湾漳壁画墓	晋阳徐显秀墓
镇墓武士		
男侍俑		
风帽俑		

〈1〉 杨泓：《隋唐造型艺术渊源简论》，《唐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 [日]小林仁(李娜译)：《中国北齐随葬陶俑两大样式的形成及其意义》，《文物世界》2012年第1期。

〈3〉 钱龙、马军：《东魏北齐的汉化形势》，《沧桑》2007年第5期；黄寿成：《汉士族与东魏北齐政权》，《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三 汉人士族的异动：北齐东方地区的墓葬

邺城、晋阳及其附近地区之外的北齐墓，从目前报道的情况看，基本分布在东方，包括冀定幽沧、青齐和徐州三个地区。冀定幽沧地区(以下简称河北地区)，出土天保十年(559)石家庄赵陵铺张承墓¹、河清四年(565)景县封子绘与夫人王氏合葬墓²、天统二年(566)平山县崔昂夫妇墓³、武平二年(571)黄骅常文贵墓⁴、吴桥北朝墓葬M3⁵、北京王府仓北齐墓⁶等。青齐地区出土天保二年

- 〈1〉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北石家庄市赵陵铺镇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第7期。
- 〈2〉 张季：《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考古通讯》1957年第3期。
- 〈3〉 河北省博物馆、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平山北齐崔昂墓调查报告》，《文物》1973年第11期。
- 〈4〉 王敏之：《黄骅县北齐常文贵墓清理简报》，《文物》1984年第9期。
- 〈5〉 河北省沧州地区文化馆：《河北省吴桥四座北朝墓葬》，《文物》1984年第9期。
- 〈6〉 马希桂：《北京王府仓北齐墓》，《文物》1977年第11期。





(551)临朐崔芬墓¹、天统元年(565)临淄崔氏墓地M5崔德基²、天统元年(565)乐陵刁翔墓³、武平二年(571)济南马家庄口道贵墓⁴、武平四年(573)临淄崔氏墓地M12崔博墓⁵、武平四年(573)益都线刻画像石室墓⁶、武平七年(576)历城宜阳国太妃傅华夫妇墓⁷、济南东八里洼北齐壁画墓⁸、淄博和庄北朝墓⁹等。徐州地区出土徐州市楚岳山庄北齐墓¹⁰、徐州东甸子村北齐M1、M2和石桥村北齐M1¹¹等。

由于邳城与晋阳地区合力的作用，都城地区对这三个地区的文化吸引力明显增强，表现在以下方面：

墓葬形制上，青齐地区虽然仍流行单室石室墓，但平面呈圆形或椭圆形的变少，如崔博墓(圆形)、济南东八里洼北齐壁画墓(椭圆形)，大多融进以邳城为代表的墓葬形制的主流——方形、近方形(梯形)或长方形之中；河北地区仍流行呈近圆形或椭圆形的砖墓，如崔昂夫妇墓(圆形单室砖墓)、常文贵墓(椭圆形单室砖墓)、吴桥北朝墓葬M3(圆形单室砖墓)、北京王府仓北齐墓(半圆形单室砖墓)等，但在邳城影响下，双室墓和单室带耳室墓基本不见，方形、长方形单室砖墓渐多。青齐地区，有些墓主人与邳城关系密切，表现出的呼应关系就更突出。如历城宜阳国太妃傅华与夫赵奉伯合葬墓，石室墓，坐北朝南，墓室平面近方形，面积近30平方米。傅华之子为北齐权臣宜阳王赵彦深，赞辅文宣帝高洋执政十余年，历事北齐数帝，北齐宰相善始善终者唯其一人；傅华作为王太妃，其墓室规格完全符合邳城、晋阳第二等级王级墓葬的尺寸。该墓还出土了三件高1米左右的彩绘石俑；这样大的俑，在邳城、晋阳地区仅见于湾漳大墓，两件大门吏陶俑放置在甬道内石门外的左右两侧，均高142.5厘米；两墓大俑的高度差别，应是王爵、皇帝之间的等级差别。可见，傅华夫妇墓除了石室、大俑为石质的地方特点外，等级是遵照邳城方面的要求设置的。

〈1〉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朐县博物馆：《山东临朐北齐崔芬壁画墓》，《文物》2002年第4期；临朐县博物馆：《北齐崔芬壁画墓》，文物出版社，2002年。

〈2〉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3〉 李开岭、刘金亭：《山东乐陵县出土北齐墓志》，《考古》1987年第10期。

〈4〉 济南市博物馆：《济南市马家庄北齐墓》，《文物》1985年第10期。

〈5〉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6〉 夏名采：《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文物》1985年第10期；夏名采：《青州傅家北齐线刻画像补遗》，《文物》2001年第5期。

〈7〉 韩明祥：《释北齐宜阳国太妃傅华墓志铭》，《文物》1985年第10期；卞文超、徐潇恬：《北齐王太妃傅华墓“失而复得”》，《大众日报》2011年4月20日。

〈8〉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文物》1989年第4期。

〈9〉 淄博市博物馆、淄川区文化局：《淄博和庄北朝墓葬出土青釉莲花瓷尊》，《文物》1984年第12期。

〈10〉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楚岳山庄北齐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0年第3期。

〈11〉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北齐墓清理简报》，《考古学集刊》第13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





墓葬壁画方面，青齐地区开始出现壁画墓，邳城、晋阳墓室顶部绘天象、四神、十二生肖、神兽异禽等，北壁绘墓主人正坐，东、西壁分绘鞍马或牛车出行的图像模式，被部分或大部分模仿。如临朐崔芬墓墓顶下部绘星象，墓室东、西壁上部分别绘仙人乘青龙与日象、仙人乘白虎与月象，北壁上部及龕额上绘神人驾玄武。济南马家庄口道贵墓墓室顶部下部绘日、月、星象，北壁绘墓主人正坐，东壁绘鞍马出行，西壁绘备车出行图，南壁墓门两侧各绘一仗剑门吏。另外，晋阳地区帷帐中墓主人身后设置屏风的做法，如徐显秀墓、朔州水泉梁北齐墓、太原热电厂北齐壁画墓等，也在青齐地区产生影响，崔芬墓、道贵墓、济南东八里洼北齐壁画墓等都出现屏风图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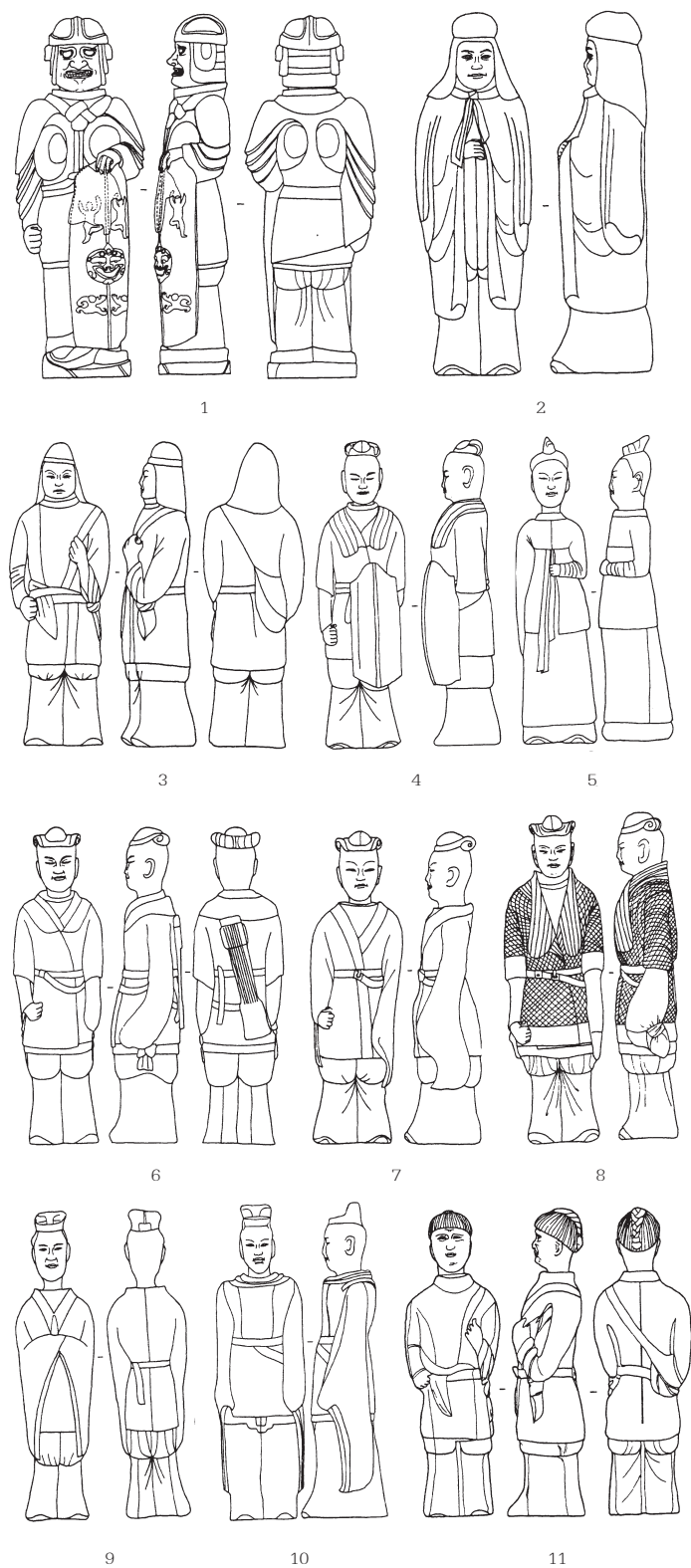
随葬品方面，从陶俑看，河北地区东魏时期就与邳城地区较为一致，北齐时期继续延续，如景县封子绘与夫人王氏合葬墓、平山县崔昂夫妇墓、黄骅常文贵墓、吴桥北朝墓葬M3等；青齐地区和徐州地区，陶俑种类、造型似邳城的墓葬大有增加，如济南东八里洼北齐壁画墓、徐州东甸子村北齐M1〔图五〕、M2等。

尽管如此，这三个地区仍然存在较大的文化离心力，而且随着都城作用的增强，反作用力也表现得更为鲜明。

1. 与邳城、晋阳墓葬等级制度不相配合的僭越行为

在河北地区，平山崔昂夫妇墓为单室砖墓，斜坡墓道，坐北朝南，墓室平面呈圆形，直径约10米，面积达78平方米左右。崔昂最高官职为祠部尚书、赠赵州刺史，但其墓室规模已远超邳城、晋阳地区第一等级的帝王墓

〔图五〕徐州东甸子村北齐M1出土陶俑
1:镇墓武士俑;2-3:风帽俑;4:步兵俑;5:女侍俑;
6-8:男侍俑;9-10:文吏俑;11:胡俑



〔图六〕北齐崔芬墓甬道门吏图
1-2:下层线刻门吏;3-4上层彩绘门吏



葬，湾漳大墓的墓室面积才56平方米左右。黄骅常文贵墓也是单室砖墓，墓室平面呈圆形，长6.2、宽4.9米，面积为30平方米左右；而其官职只是兖州嬴县令、赠青州乐安郡太守，身份只相当于邺城、晋阳墓葬第三等级偏下，墓葬规格却达到了第二等级的水平。

2. 墓葬壁画出现屏风式壁画的新构图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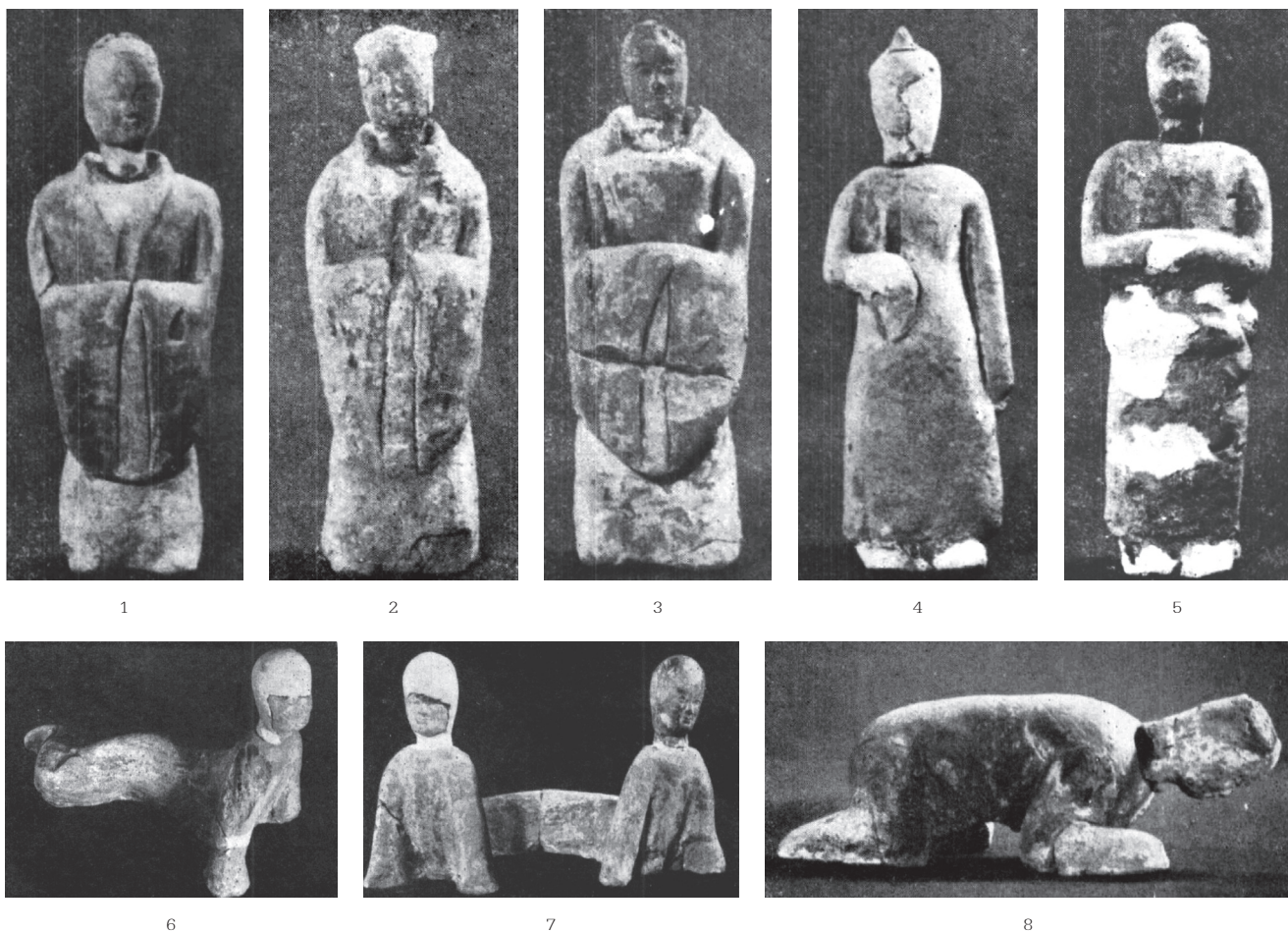
青齐地区在吸收邺城图式的时候，会不拘泥于格套，自行发挥和改变。如道贵墓墓室西壁的备车出行图，所绘牛车只有车，没有牛。崔芬墓的变化就更多，四神图像中的青龙、白虎、玄武都按格套画在了墓壁上部与顶部相连的位置，只有朱雀绘在正壁上，位于南壁下部墓门西侧。男、女墓主人本应绘在北壁，却绘在了西壁龛额上，且男、女墓主人非并坐，而是在侍从簇拥下前、后徐行，状如北魏龙门石窟、巩县石窟中的礼佛图^{〔1〕}。甬道两侧壁各有两层门吏图，下层各阴线刻一双手杖剑、斜立侧目的小冠门吏〔图六：1、2〕，上层各以一彩绘武士门吏覆盖，两武士均一手杖盾、另一手的腕部悬挂长剑，而腾出的手部做出相互示意的姿态，形象生动，活泼有趣〔图六：3、4〕。下层门吏状如晋阳地区壁画，上层门吏的服饰和姿态则明显自成一套，以上层门吏取代下层反映了墓主人的文化摇摆和最终取舍。更具创新性的是，青齐地区突破了晋阳地区屏风设于帷帐内的局促图式，发展出屏风式壁画的新构图形式。屏风式壁画将屏风覆盖整个壁面，形成整体画面的外轮廓，成

〔1〕 贺西林、李清泉：《永生之维——中国墓室壁画史》页112，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图七〕临淄北齐崔博墓出土陶俑

1-2:文吏俑;3:武士俑;4:女侍俑;5:胡帽俑;6:人首蛇身俑;7:双首俑;8:跪伏俑



为画面的主体，而不再是墓主人身后的衬景，其他题材只能在屏面上表现或成为其附属物，这是青齐地区的创举。崔芬墓墓室四壁下部绘屏风画，除南壁东侧两幅未绘的空白屏面外，共绘15幅画面，包含“竹林七贤与荣启期”、舞蹈、牵马、拴马、树木山石等内容。道贵墓墓室北壁，墓主人和两侧侍从的背后绘有九格屏风，屏面绘山峦流云；这组屏风画仍与墓主人相配，尚存以往的衬托作用，但本身覆盖整个北壁并跨越到东、西壁上，显得格外突出，墓主人及其侍从仿佛融进屏风之中。济南东八里洼北齐壁画墓北壁及其与东壁转角处，绘三足八扇屏风，上部的垂帐、两侧的帷幕成为其装饰物，而不能夺其主体地位；中间四扇每扇绘一高士，当亦是“竹林七贤”题材。

3. 墓葬陶俑等体现出家族个性色彩

青齐地区的临淄崔氏家族墓地自北魏晚期以来，陶俑就显示出与众不同之处。如M10出土的两件武士俑皆为坐像，有底座，浓眉大眼，高鼻上翘，连鬓胡须，左手残，右手持棒状物，右腿后曲，左腿前伸；有一件头残侍仆俑，右手握拳曲放胸前，左手提一鱼；还出土十二生肖俑六件，带有龕台，计有虎、蛇、马、猴、狗及生肖俑已失的龕台各一件。到东魏时期，则以崔混墓陶俑为代表，



〔图八〕徐州市楚岳山庄北齐墓陶俑及相关比较

1-5:楚岳山庄北齐墓;6:北魏王温墓;7、9:北魏郟定兴墓;8:北魏元睿墓;10:北魏崔鸿墓



虽然不见M10那样的特殊俑类，但表现另类的路子没有变，造型和服饰的整体风格与邺城、晋阳差异明显。5件武士俑呈站立状，双手拱于胸前，深目高鼻〔图一：5、6〕；有的女侍俑手提陶罐，似为汲水者〔图一：8〕；还有胡帽俑〔图一：10〕；这几种俑都是邺城、晋阳所没有的。到北齐时期，崔博墓陶俑继续别领风骚。文吏俑、武力俑着高领袍服〔图七：1-3〕；女侍俑的右手垂袖〔图七：4〕，此造型见于晋阳地区，如徐显秀墓的风帽俑之一、甲士俑〔图四〕，但服饰和性别迥异；胡帽俑继续发展〔图七：5〕；更出奇的是，出现单人首蛇身俑〔图七：6〕、双人首蛇身俑〔图七：7〕、跪伏俑〔图七：8〕等特殊俑类。从临淄崔氏墓地M10、崔混墓到崔博墓，尽管俑类没有呈现出连续演变的轨迹，但共同体现了清河崔氏乌水房的个性。不求自家统一，但求与主流俑群不同，似乎成为崔氏家族葬俗的一个标记。另外，为人熟知的就是乌水房墓葬都使用石室墓，北魏至东魏是圆形或椭圆





形，北齐时期多是近方形，并且这些特征向外族、外地扩散¹。

徐州市楚岳山庄北齐墓出土陶俑7件，均身着立领长袍；其中男侍俑有2件，形制基本相同，头戴小冠，双手杖剑于身前〔图八：1〕；5件女侍俑〔图八：2-5〕中，有2件双尖丫髻俑〔图八：2〕。这两种俑不见于东魏、北齐时期邺城、晋阳的墓葬，北魏晚期墓葬倒是出现，如洛阳王温墓、正光三年(522)郭定兴墓²的杖剑小冠男侍俑〔图八：6、7〕，洛阳熙平元年(516)元睿墓³、郭定兴墓和临淄孝昌元年(525)崔鸿墓⁴的双尖丫髻女侍俑〔图八：8-10〕等，但这两种俑在北魏时期并不流行。徐州北齐墓葬中重现这两种俑，并在造型上大有变化，以立领为显著特征，也表现出与北齐中心地区的不一致，与临淄崔氏墓葬陶俑相比，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徐州这类俑或也具地方大族背景，而彭城刘氏恰与南、北朝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4. 对南朝文化因素的援引

青齐地区和徐州地区与南朝渊源已久，在北魏占领之前，是南朝宋的疆域。东魏时期，徐州又处在南、北朝争夺的前线。这两地汉人大族的成员往往分处南、北，相互保持联系。因此，在这两地出现南朝因素实属正常。徐州地区的几座北齐墓，均为单室砖室墓，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加上甬道，整体形状则呈“凸”字形，正是南朝墓葬的典型形制；墓室用花纹砖砌筑，上有圆圈纹、菱形纹、莲花纹、胜形纹等纹饰，也是南朝墓葬习俗。青齐地区，临淄崔博墓墓室右侧有石板平铺的棺床，左侧壁下有一方形石案，应是学自南朝墓葬中以多块石板设置棺座、旁设祭台的做法。临淄崔德墓墓底平铺石板，临朐崔芬墓墓室西部设置数块石板拼接的棺床，大致也是同样的做法。还有一项最为著名的表现形式，就是墓葬壁画引入“竹林七贤与荣启期”题材。我们发现，随着北齐疆域扩展到长江北岸，邺城、晋阳文化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之时，已远离南朝边境的青齐地区对南朝因素的吸收也在加强。这难免令人想到青齐地区在援引南朝文化因素抵御邺城、晋阳文化的渗透和扩张。“竹林七贤”题材的出现使这种意图趋于明显。这一题材曾是南朝宋、齐与北魏争夺正统的重要举措⁵，如今为青齐墓葬所用，体现的已不是南北朝之间的对抗，而是北齐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博弈。

以上种种新特点，让我们感到北齐东方地区的汉人士族在文化上存在着诸多与邺城、晋阳不一致或者说刻意对抗的异动，尤以青齐地区最突出。这种文化格局的奠定始自高欢。高欢依靠六镇鲜卑族和河北大族共同建立了东魏政权，北齐因之，邺城、晋阳胡汉分治的“双核”体制的形成正是基

〈1〉 倪润安：《试论北朝圆形石质墓的渊源与形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2〉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纱厂西路北魏HM555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9期。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县杏园村的四座北魏墓》，《考古》1991年第9期。

〈4〉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5〉 倪润安：《南北朝墓葬文化的正统争夺》，《考古》2013年第12期。





于此现状。高欢冀郡起兵之时，河北士族“猬起应之”，而青齐士族首鼠两端，反应冷淡、滞后¹⁹。这一态度的差别导致东魏北齐时期，河北士族的主要人物位高权重，能够进入中枢决策机构，成为胡汉共治的主要力量，青齐士族得任高官者则很少。不过，河北士族、青齐士族都未能逃脱被东魏北齐政权削弱势力的命运，只是地位相对低落的青齐士族率先受打击，措施直接、手段严厉，而地位较高的河北士族受打击晚一些，有些措施比较温和与隐晦。北齐朝廷成功地削弱了汉人士族的势力，实现了基层统治的表面稳定，但也由此失去了汉人士族的认同²⁰。虽然汉人士族丧失了武力，但征服其文化心理却难得多。青齐墓葬文化中的家族个性、另类做法和引南朝文化以抗衡的行为，都是青齐士族内心不服的表达。河北地区崔昂墓、常文贵墓的僭越行为，出现于河北士族势力遭削弱的北齐晚期而不是其势力正盛的东魏至北齐初期，也应是他们内心失衡、发生反弹的结果。这些行为被容忍存在，表明北齐政权在汉人士族已无能力军事叛乱的情况下，为不过于激化矛盾，对他们的文化异动举措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

四 北齐残局对隋唐社会制度与历史走向的影响

北齐灭亡后，其文化残局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深刻地影响了隋唐社会制度与历史走向，发挥着正、负两个方面的作用。

正的方面，北齐与北周文化融合形成新的隋唐文化，这是大家通常都注意到的。北齐主体文化围绕着邺城、晋阳“双核”体制构建，其结构和内容被周、隋统治者继承与改造。北周大象二年(580)，大丞相杨坚平毁邺城；开皇二年(582)，隋文帝下诏营建新都大兴城；大业元年(605)，隋炀帝下诏营建东京洛阳城。这样在摧毁北齐“双核”后，隋朝又新建起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两京体制，为东、西部文化的融汇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开皇三年(583)，隋文帝明令参照梁和北齐制度制定新礼制，改变了北齐文化作为亡国余孽的被动地位，为其进入新王朝的主流文化铺平了道路。北齐文化因素大举进入关中，与北周文化因素的融合进程主要在这里进行。从墓葬文化的角度，可以迄今发掘的最高等级的隋墓——潼关税村壁画墓为线索来观察，该墓年代在仁寿末年至大业初年(604-606)，很可能是废太子杨勇墓²¹。

墓葬形制方面，税村墓由北周式的墓道和北齐式的墓室构成。该墓坐北朝南，由长斜坡墓道、7个过洞、6个天井、4个壁龛、甬道和砖砌单墓室组成。这种带天井、过洞和壁龛的墓葬建构与咸阳发掘的大量高规格的北周墓葬呈现出很大的相似性，而东魏北齐墓葬中，带天井的极为少见，只有娄

¹⁹ 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页1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²⁰ 侯旭东：《地方豪右与魏齐政治》，《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

²¹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文物出版社，2013年。





睿墓与徐显秀墓各出现了一个天井，且形制也不统一⁴¹。税村墓墓室平面呈圆形，材质和形状都是北齐东方地区的墓葬形制，但在关中隋墓中为孤例。关中隋墓的主体是土洞墓，分为双室和单室，双室墓的前室为方形、后室为长方形，单室墓平面以近方形为主⁴²。这两种形制正是北周墓葬的典型形制⁴³，而北齐墓葬形制以平面呈弧方形的单室砖墓为主⁴⁴。所以，从关中隋墓的整体情况看，墓葬形制沿袭北周。

墓葬壁画方面，税村墓也是北齐式和北周式壁画的结合体。除天井上部和壁龛外，该墓自墓道直至墓室的所有壁面均绘壁画。第一过洞南口外上方的门楼图、天井底部两壁的杖刀侍卫、过洞、甬道及墓室内的影作木构，系北周作法。徐显秀墓过洞上方也出现门楼图，表明北齐晚期晋阳墓葬已受到北周墓葬的一定影响。税村墓墓道东、西二壁绘出行仪仗图，呈对称布局，各有46人、一匹马和一座戟架，分为七组，这种大场面的仪仗队列与东魏茹茹公主墓、湾漳北齐墓、北齐徐显秀墓墓道仪仗图有渊源关系⁴⁵。税村墓墓室顶部绘星象图，四壁壁画脱落，从壁画残块看有侍女、蜡烛等画面。墓室四壁绘影作木构之下持物的侍女，是初唐墓葬壁画的常见题材，如龙朔三年(663)新城长公主墓⁴⁶。初唐墓室壁画中，已无法确认墓主人是谁，墓主人形象的消息进而成为唐墓壁画的通例。究其渊源，我们怀疑税村隋墓中就不绘墓主人形象。再向前追溯，北齐墓室正壁所绘主要人物居中正坐、两侧侍从持伞扇拥立，两侧壁又配以鞍马、牛车出行仪仗，可以毫无疑问地指认主要人物就是墓主人；而北周墓葬壁画(不含葬具图像)中，迄今没有发现墓主人形象⁴⁷，以往认为是保存状况不佳、没有留下。现在联系税村墓及初唐墓的情况，可推测北周墓葬壁画中已将墓主人隐去，是这种做法的源头。

随葬品方面，税村墓出土最多的是各类陶俑。从北朝晚期的情况看，北周陶俑为半模制成，平背、实身，造型粗陋，塑工拙稚；北齐陶俑为合模制成，中空，塑工比较精致。到隋代关中地区，在三原县开皇二年(582)李和墓⁴⁸中可以看到典型北周特征的俑类要多于典型北齐特征的俑类。典型北周特征的俑一直持续到开皇中期仍有出现，如西安郊区开皇十二年(592)吕武墓⁴⁹等。开皇后

41 邵小莉：《隋唐墓葬艺术渊源新探——以陕西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为中心》，《文艺研究》2011年第1期。

42 刘呆运：《关中地区隋代墓葬形制研究》，《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4期。

43 倪润安：《北周墓葬的地下空间与设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1期。

44 杨效俊：《东魏、北齐墓葬的考古学研究》，《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5期。

45 邵小莉：《隋唐墓葬艺术渊源新探——以陕西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为中心》，《文艺研究》2011年第1期。

46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历史博物馆、礼泉县昭陵博物馆：《唐新城长公主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

47 倪润安：《北周墓葬的地下空间与设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1期。

48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三原县双盛村隋李和墓清理简报》，《文物》1966年第1期。

4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西安郊区隋唐墓》，科学出版社，1966年。





期起，北周那种半模、平背、实身特征的俑类消失，制作方式基本上转为北齐陶俑那样的合模制法。因此，税村墓中已看不到具有北周制作特征的俑；造型上，虽可寻北周遗痕，但并不引人注目，即犬俑没有采用北齐的趴卧式，而吸收了北周的蹲踞式。该墓还出有一套重要的随葬品——画像石棺，是对西魏、北周石棺的延续，形制基本相同；在纹饰上，西魏、北周石棺前挡刻门吏或门神与朱雀，后挡刻玄武或神人御玄武，两侧挡分刻青龙、白虎，棺盖上刻伏羲、女娲，如西魏魏后三年(556)葬郭生墓石棺⁴¹、北周保定四年(564)葬李诞墓石棺⁴²等；税村墓石棺前、后挡分别刻门吏与朱雀、神人御玄武，两侧挡刻仙人驾车出行，前、后挡的纹饰近与北周类似、远可追及北魏，两侧挡和棺盖上的纹饰则承袭了北魏画像石棺的图案形式，各处边饰也体现了多种文化内涵。可见，税村墓石棺沿着西魏、北周石棺的历史轨迹上溯至北魏传统，并广泛综合利用了大一统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宗教的相关图像素材⁴³。

通过分析税村隋墓，可知北周、北齐文化因素在关中融合的大致情况。墓葬形制上，北周因素占优势；墓葬壁画上，二者平分秋色；随葬品上，北齐因素在陶俑方面占优势，葬具方面以西魏、北周石棺为基础，追溯至北魏传统。总之，隋墓文化对北周、北齐因素各有取舍，重组融汇，力图建构统一的文化面貌，决定了此后唐墓文化的主流走向。

负的方面，来自于周、隋、唐政权对北齐格局中东方地区的处置策略。北齐时，其东方地区就与邺城、晋阳不合，周、隋政权接收了邺城、晋阳的文化遗产，对东方地区却采取压制政策，导致东方地区的不服情绪未能获得释放；至唐代，也未能扭转这种形势，终为河北地区发生安史之乱埋下祸根，青齐地区文化也因此唐代长期沉沦、籍籍无闻。

北周灭北齐，原北齐东方地区唯一没有被征服的是东北的营州地区(今辽宁朝阳)，出现高宝宁割据势力。《北齐书·高保宁传》记载：“高保宁，代人也，不知其所从来。”⁴⁴《隋书·阴寿传》则载曰：“时有高宝宁者，齐氏之疏属也。”⁴⁵也有学者认为高宝宁很有可能是当地的高句丽移民后裔⁴⁶。高宝宁很有实力，能够调动契丹、靺鞨骑兵发动进攻，并获得高句丽、突厥的支持。北周遣使招慰，却未用兵讨伐，使其成为后患，直到隋初都是隋文帝的心病。开皇三年(583)，高宝宁兵败被部下所杀。高宝宁虽死，但以其为结点形成的东北地区突厥、高句丽、奚、契丹、靺鞨等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压迫之势并没有解除。隋唐因此多次征伐高句丽、突厥，到唐高宗时，终于建立起一套东北边境防

4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周郭生墓发掘简报》，《文博》2009年第5期。

42 程林泉、张翔宇、张小丽：《西安北周李诞墓初探》，《艺术史研究》第七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

43 邵小莉：《隋唐墓葬艺术渊源新探——以陕西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为中心》，《文艺研究》2011年第1期。

44 《北齐书》卷四一《高保宁传》，页547，中华书局，1972年。

45 《隋书》卷三九《阴寿传》，页1148，中华书局，1973年。

46 王小甫：《隋初与高句丽及东北诸族关系试探——以高宝宁据营州为中心》，《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页47，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御体系，但到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696-697)，便被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发动的“营州之乱”打破，塞外营州与安东都护府这两道屏障失守，东北防线的重心被迫南移到幽州一带。唐玄宗力图恢复营州、幽州两地的犄角之势，努力经营营州的同时，又加强幽州的军事力量，被迫全力倚仗地方社会力量尤其是胡人来抗御东北诸族，最终导致安禄山手握重兵，在幽州坐大，变生“安史之乱”，进而出现“河朔割据”¹⁾。与这种政治、军事背景相适应的是，隋至盛唐时期的营州墓葬流行椭圆形或圆形的墓葬，并出有一批镇煞俑，包括观风鸟(人面鸟身俑)、墓龙(单或双人首蛇身俑)、仪鱼(人首鱼身俑)、伏听(跪伏俑)、狮形或虎形怪兽(地吞)、十二生肖俑等。这些文化因素进一步扩展为辽西至河北地区唐墓的普遍特征，形成与中心地区西安、洛阳区别较大、自成体系的文化区域。而圆形墓、单或双人首蛇身俑、跪伏俑、十二生肖俑的渊源又可追溯到临淄北朝崔氏墓葬²⁾。这种文化形势显示出北齐东方地区文化因素以营州为残留据点，终于在唐朝河北地区实现复辟和发展，同样表现出与中心地区主流文化的抗衡姿态。还不止于此，处于中间地带的山西、河南等地墓葬中也出现镇煞俑。可见，唐朝的河朔割据比北齐的士族异动又来得更为猛烈，影响范围也更大，将唐朝引向下行衰亡的道路。

隋至唐初的青齐地区，由于精英人物的集团性流出，导致本地文化失去推动力量，变得黯淡无光。主要有四次人才流失：第一次是北周灭北齐之时，周武帝下诏“邹鲁缙绅，幽并骑士，一介可称，并宜铨录”³⁾，并征十八名北齐最著称的文士随驾入朝；第二次在隋开皇初，隋文帝诏敕关东诸州加大力度搜扬士人，又有一批旧齐士人被征入关；第三次在隋大业初，隋炀帝营建东都，大规模移民洛阳，主要针对关东的衣冠豪强；第四次隋末唐初时，经过前几次的迁徙，青齐、河北的高门旧族多已远离故土，代之而起的是大多出身寒微的“山东豪杰”，而这些人隋末大乱和唐王朝建立过程中，或被消灭，或作为功臣也进入关中⁴⁾。北周末至唐初，大量人才流入关中，充实了关中文化，但另一方面则造成初、盛唐时期青齐、河北文化发展的低落，青齐地区又更加突出。“安史之乱”末期的上元二年(761)，原驻守营州与安史军队连年攻战的平卢节度使侯希逸被迫率部南下青齐，从而成为平卢淄青节度使。作为外来力量，他们并没有改变当地的文化面貌。由于前述营州的独特因素已成为安史控制的河北地区墓葬文化的特色，侯希逸为表示与他们划清界限，便加以抵制，从而导致这些因素盛唐之后在营州基本消失。既然在营州已经舍弃，侯希逸自然不可能再把这些因素

1) 李松涛：《论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之乱》，《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页94—115，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李松涛：《试论安史乱前幽州防御形势的改变》，《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页116—130，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2) 齐东方：《隋唐环岛文化的形成和展开——以朝阳隋唐墓研究为中心》，《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页133—160，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3) 《周书》卷六《武帝纪下》，页99，中华书局，1971年。

4) 牟发松：《旧齐士人与周隋政权》，《文史》2003年第1辑；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金明馆丛稿初编》页217—23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带到青齐地区去。永泰元年(765)至元和十四年(819),李正己、李纳、李师古、李师道祖孙三代四人世袭平卢淄青节度使达55年,与唐朝廷离心离德,“职贡不入,法令不加,率以为常”¹,宁可没有文化特色,也不引入两京地区的文化因素。李师道灭亡后,平卢淄青节度使一分为三,重新听命朝廷,但此时两京地区的文化却陷入没落,对青齐地区无力产生明显影响。因此,有唐一代,青齐墓葬的文化特征很不明确,辨识困难。如果不出墓志或具有鲜明唐代特征的物品,一般不能从墓葬形制认定其为唐墓。山东宁津元和九年(814)王斌夫妇墓²为前、后双室墓,墓葬形制在晚唐两京地区少见,随葬品也少,仅从陶砚、铜棺钉判断年代是没有把握的,断其为唐墓所依据的是“开元通宝”铜钱和王斌墓志。青州市郑母镇唐墓³为长方形竖穴单室砖墓,年代判断靠的是所出三彩炉、葵花形鸾鸟镜。临沂市药材站唐墓M2⁴为船形竖穴单室砖墓,以所出“开元通宝”铜钱证实其年代。

作为原北齐东方地区的一部分,河北的文化对抗和青齐的文化低落都是北朝晚期地域文化格局中未能解决的矛盾的延续,在隋唐文化体系中聚而不化,遗患难休。中晚唐时期,这种顽疾又被不断效仿、复制,藩镇割据日剧,终致巨唐分裂,大厦倾覆。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项坤鹏)

〈1〉 《旧唐书》卷一二四《李师道传》,页3541,中华书局,1975年。

〈2〉 吕来升、王玉芝:《山东宁津发现纪年唐墓》,《考古》1993年第10期。

〈3〉 李光林:《山东青州市郑母镇发现一座唐墓》,《考古》1998年第5期。

〈4〉 邱播、苏建军:《山东临沂市药材站发现两座唐墓》,《考古》2003年第9期。其中M1为圆形单室砖墓,壁面有砖雕斗拱、假门、假窗、灯擎、一桌二椅,不能确认为唐墓,可能晚到五代、宋初。

